

目 录

观察与思考

- 4 1994年中国经济纪事
9 引大入秦工程中的“三国
演艺”
13 美国影视业与亚洲市场
——在中美知识产权之
争的背后

黄克诚自述

“油作检查，才是我

海容

赵小兰

黄克诚自述：“连心地作

检查，才是我真正的错误”

战风云：罗斯福走向战争

在中美知识产权之争的背后

远嫁国外的明星们

房产大泡沫

- 69 战后日本赔了中国多少？

婚姻与家庭

- 70 王蒙是谁？——我是怎样
成为王蒙的妻子的
75 远嫁国外的明星们
81 婚姻：选择的艺术
83 调侃婚姻
84 走在爱情边缘

文艺园地

- 86 本世纪末，中国作家在干
什么？
88 《水浒》怎么拍？
89 王朔的剧本“托拉斯”
90 电影故事：《南京大屠杀》
94 '94影视演员大排榜

随感录

- 95 不妨学一点“没落文化”
97 逃避是一种人生境界

经济生活

- 98 '95攻坚战：遏制通货膨胀
与国有企业改革
101 中国在美投资损失惨重
103 信用消费方兴未艾
104 最优秀的人当老板
外商垄断我市场已显苗

头

书 馆



93017172

观察与思考

- 4 1994年中国经济纪事
- 9 引大入秦工程中的“三国演艺”
- 13 美国影视业与亚洲市场
——在中美知识产权之争的背后

人物

- 16 黄克诚自述
“违心地作检查，才是我真正的错误”
- 23 风云变幻中的王海容
- 28 美国政坛华裔女杰赵小兰
- 32 张德培其人其事

热点透视

- 34 商品房大摇滚
- 37 三资企业的利弊得失
- 41 另外一种暴利

二战风云录

- 46 罗斯福走向战争
- 56 美国巨型巡洋舰沉没之谜
- 61 南京城破之后
- 62 原子弹炸广岛该不该?
- 63 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不同反思

往事钩沉

- 64 抗美援朝时期的秘密外交

- 69 战后日本赔了中国多少?

婚姻与家庭

- 70 王蒙是谁?——我是怎样成为王蒙的妻子的
- 75 远嫁外国的明星们
- 81 婚姻:选择的艺术
- 83 调侃婚姻
- 84 走在爱情边缘

文艺园地

- 86 本世纪末,中国作家在干什么?
- 88 《水浒》怎么拍?
- 89 王朔的剧本“托拉斯”
- 90 电影故事:《南京大屠杀》
- 94 '94影视演员大排榜

随感录

- 95 不妨学一点“没落文化”
- 97 逃避是一种人生境界

经济生活

- 98 '95攻坚战:遏制通货膨胀与国有企业改革
- 101 中国在美投资损失惨重
- 103 信用消费方兴未艾
- 104 最优秀的人当老板
看重外商垄断我市场已显苗头



改革与国情

- 106 省地级干部谈地区差距
- 108 控制物价涨幅的十项措施
- 108 我国将实施“百千万工程”
- 108 今年中国裁干 200 万
- 109 我国拟建十大工业特区
- 109 我对引进外资将有大的调整
- 109 职工“无病长休”行不通了
- 110 医疗机构将发展其他所有制形式
- 110 津贴奖金一律纳税

港澳台之窗

- 111 1997 年香港憧憬
- 114 香港新机场
- 115 “中国因素”在香港
- 100 内地资金列香港外来投资之首
- 116 豪门联姻 政商一体
——从连战嫁女说起
- 33 台湾十大畅销作家

国外见闻

- 118 印度正在追赶中国
- 121 无奈的制裁
- 125 漫话伦敦金融城

- 127 瑞士：小国的幸运
- 130 过齐奥塞斯库墓
- 131 俄罗斯爱情之旅
- 134 国外的“诸葛亮热”
- 113 年薪最高的政府首脑

百科知识

- 135 美元贬值，中国利弊何在？
- 136 哈马斯运动的历史与现状
- 138 何谓俄罗斯国家杜马？
- 139 世界三大经商务
- 74 最高价的商标
- 140 书画作品的外观优劣
- 140 钱币增值的秘密
- 141 《三国演义》中人物为什么都是单字名？
- 142 司马迁描述的秦始皇陵准确吗？
- 142 台湾人的怪姓
- 143 太阳大约 2 亿年绕银河系一圈
- 144 全球原始地域有多少？
- 144 未来地震危害动摇世界经济
- 144 今年两逢立春，两度中秋节
- 145 中国古代医学的世界之最
- 145 多吃多动人长寿
- 147 多食硬果健脑强身
- 148 血型与体育
- 148 商品房产权及面积计算

九州方圆

- 149 三峡工程年内投资 70 亿

- 149 京九沿线经济增长带
150 华北将出现南水北调大运河
150 引黄入晋大工程开动
150 黄河 45 年“吐出”一个县
151 今明两年我国重点建设 12 个机场
151 上海渐成全国资源配置中心
152 京城旅游新花样：串胡同
152 广州人浑身是“险”
152 商务钟点秘书俏羊城
153 羊城盛行“家庭影院”
153 布达拉宫等四古迹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53 敦煌发现“复层壁画”

中外书摘

- 154 《新三字经》

新论点

- 156 九五经济蓝皮书：增长率管住百分之九 通胀率看守百分之十
156 目前的消费不是超前，而是相对滞后
157 今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三种可能
158 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不是“渐进战略”而是“外围战略”
158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新特点
159 作家应对文学保持投入和思考
159 我国出版业利用外资的可行性
160 社会学家设计的女性生活

《读者参考》丛书(2)

1995 年 4 月 15 日

编辑：《读者参考》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 雨

责任编辑：金 辉 桑 木

封面设计：舒 音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邮政编码：200020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丹阳市新华印刷厂

印张：5

字数：18 万

ISBN 7-80616-086-8/Z·2

定价：3.50 元

1994 年中国经济纪事

王安

自从1992年中国经济飞速疾跑至今，其间有过几番刹车和加速；对于中国经济的冷与热，亦有反复争论和拍板。说来，1994年虽有汇率并轨、税制改革、银行商业化改造、推行国有企业破产试点等多项改革，也有国内生产总值空前地突破40000亿的发展高速，但总体来说这一年呈收缩之势。

物价突破调控目标

设定中国经济呈收缩之势，最直接的原因是物价。年初设定的物价涨幅调控目标是10%，据推测，全年将超过19%。

物价从一开年就显出跳脚的架式；1月和2月，全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20%。此后国家开始对20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进行监审。另外，1993年4月精简掉的国家物价局在众多议论中开始酝酿恢复。

到4月，居民消费品价格明显回落。到年中，许多专家甚表乐观。谁料7月刚到，零售物价指数突涨21.4%，城乡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更直指24%，均攀上1989年以来物价涨幅的最高点。到9月，零售物

价竟比上年同期上涨20.9%。

最急的是政府。在多年强调运用经济手段之后，今年动用行政手段似颇理直气壮：直到本世纪30年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都是自由竞争、自由调节、自由放任；然而，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打破了“看不见的手”法力无边的神话，政府要干预经济的主张，被主要西方国家所采纳。现在我们要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要专捡历史早已摒弃的东西呢？更何况，粮棉等商品的价格和流通因一度放任不管造成的价格暴涨，难道不是教训吗？

中央提出，从10月开始，公布的物价指数不再只是全国一个数字，还要有各省的数字，以此增加透明度，发挥对各地的监督作用，并要求把控制通胀的成绩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10月底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推出货币供应量统计监测指标，对于货币监测和金融宏观调控似更科学化，更趋近于国际惯例。中国百姓对物价是很敏感的，并往往上升到政治高度，然而1994年却有点怪，在物价空前趾高气扬时，百姓却空前地把往银行里放票子。

1994年前三个季度，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比去年同期多增加2327.10亿元，增长95.41%，仅第三季度就增加1620.91亿元。

这一切是在负利率达十几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发生的；9月物价指数是22.5%，而银行名义储蓄利率是7.98%。转型期的中国处在两难状态：要稳定币值减少通胀紧缩资金投放时，国有企业就经营困难、工人失业，于是只好放松银根，结果通胀又来。因此，抑制通胀和刺激增长（就业）一直是中国决策层权衡的焦点。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代表了一派观点：在一定程度的通胀下，人们只要有工作有收入，就可以维持生活，但如果失去工作人们必有极端行为，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最可怕的不是通胀，而是失业。

到年底，物价涨幅趋缓，暂松一口气。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

近年中国中央财力下散，使其调控经济的能力受限。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第19期表示了愤怒：近年有的地方对中央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打擦边球，把“闯红灯”作为加快本地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这种以损害全局利益而求自身发展的做法，危害了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目前我国投资增长高居不下，宏观形势趋紧，岂能说与这些人的不听话招呼无关？各级政府似在尝试捡起

行政手段：

△到2月，棉花的国家调拨任务只完成42%左右。因而秋后，中央严令棉花牢牢掌握在国有主渠道手里。

△中央银行多次采取措施制止地方银行高息揽储。

△各地相继出台反暴利法规，作为压抑通胀的手段之一。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禁止擅自批准发行彩票。

△国家证券委决定停止钢材、食糖、煤炭、外汇等期货交易。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暂停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和交易机构的活动。

△武汉4家房地产公司非法集资，房屋拆零销售活动被制止。

△温州查处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机构，三家“农基会”存款被冻结。

最难推行的当是分税制。朱镕基副总理表示：分税制的要点是中央收中央的税，地方收地方的税，过去中央只占28%，经济体制改革后，富了一些省份，穷了中央。财税改革目标就是中央占60%，以帮助穷省份。朱镕基说：“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去谈，结果自己掉了2.5公斤的肉。”朱镕基推崇“犯其至难，图其至远”，他说：“中国经济改革不从难处着手，就不能再前进。”

产权转移能救国企吗？

难中之难是国有企业改造。

4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公布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两个面临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程度加剧，亏损额增加，国有工业生产仅比去年同期增长2.2%。

然而到了5月，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却宣布国有企业“总的形势是好的”，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4.7%，并未出现所传国有企业大面积停产半停产的状况。

作为父母官，王忠禹替国企说话是名正言顺的，百姓也欢喜国有企业茁壮成长。但这茁壮的机制是什么？过去是学乡镇企业，1994年的热点是产权交易。

中策现象引起大波：两年间香港中策公司斥资33亿元，获得了中国大陆上百家国有企业的控股权，建起35家合资公司，然后开始把部分公司带到境外上市，炒卖国有企业。有人说这是吸引外资的一条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反对者认为，这可能使我们对外资产生过分依赖，使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替代率提高。

国企产权交易确实有国有资产贬值和流失的问题，但也有人提出：国有资产闲置造成的贬值比明面的流失更可怕。

争论归争论，国务院一纸禁令停止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理顺了再说。对于国企机制改造，决策层更倾向的是破产，明年将在20个城市推行。破产首要的问题是职工安

置。

国债发了1000亿

1994年债券打蔫，股市低落，期货不振，基金萎缩。唯一火的是国库券，发了1028亿元，而上年只发350亿元。

国债发行已走过13个年头，如今已到了绝不可少的地步，债未发出，便已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派上了预算。

为吸引资金，国债利率被提到了空前的水平：两年期国债年利率13%，三年期达13.96%。这么高的借债成本很让人感到沉重。好在国家有国家的道理，国家有国家的权力，借新债还旧债倒也是国际通行做法。

1995年偿还国债将达700亿元。

另外，1994年外债还本付息额达200亿美元，年底外债余额将突破1000亿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是，到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98.36亿美元，比年初的212亿美元增加了186.36亿美元。

专家认为，中国的偿债率和债务率均处于国际公认的安全区域之内。

猫和鼠联手走私

几个大案在1994年有了结果。

沸扬全国的沈太福长城集资案，4月1日以沈太福被处决了结。沈被指控犯有贪污罪和行贿罪。同

案犯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犯受贿罪和贪污罪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长城案还扯进一批记者。

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李效时是第八个因经济犯罪而受到处罚的副省部级以上的干部。

因刺探和窃取国家金融经济秘密，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外事局办公室副主任田野和香港《明报》记者席扬被分别判处15年和12年有期徒刑。境外记者和官员同案被判刑尚不多见。

金额最大的诈骗案可能要数1993年4月发案的农业银行衡水支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1994年5月8名案犯被判20年至1年徒刑。100亿美元已全数避税。与之相对应的，199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是212亿美元。

五六月间3起走私分子与政府官员及执法人员相勾结的走私大案得到处理：山东乳山案3名罪犯死刑，广东珠海案1名罪犯死刑，丹东市长被撤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过去官员涉及经济犯罪只要没往自己腰包装便罪减三等，而今中国已开始向法人犯法开战。

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4起中央国家机关处以上干部经济犯罪案件，其中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原总经理郭子文、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福建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公司投资处原处长胡聪被判死刑。11月，中央再次发命禁止领导

干部坐进口轿车。

复关好事多磨

自从1992年中国百姓知晓了关贸总协定，复关日期的传说便一波一波沸沸扬扬，中国政府也多次降低关税，提高关贸制度的透明度，处罚从事非法转口贸易和违反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但屡屡好事多磨。

5月，举足轻重的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先生来华，他表示：中国在复关进程中取得的进展是积极的，但要在设定的时间内复关难度相当大。

据观察，中国复关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和欧共体，尽管美国官员一再声称支持中国复关。实际上，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高速发展的经济对美国人具有相当吸引力，两国间贸易量急剧增加。

在一年一度的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审议关口，5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延长1994年至1995年度中国最惠国待遇，并表示以后的年度审议与人权问题脱钩。其后的9月3日，美国商务部长罗纳德·布朗结束为期8天的访华，在他带来的众多协议中，仅中美电力合作协议的三个项目，总金额就超过了40亿美元。

11月28日，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龙永图提出在1994年底前结束中国复关实质性谈判的时限。若逾期，中国在复关议定书和市场准入谈判中不再作新的实质性出价，

不再主动要求同各缔约方举行双边磋商。

在提出最后时限之前，中国复关最后一揽子方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中国愿意将关税总体上限水平降至35%，复关后5年内降至30%。这与1992年税率相比，中国关税总水平将下降一半以上。

据悉，美国和欧盟准备考虑把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创始国加入该组织的最后期限推迟到1995年5月或6月。

复关虽暂时无望，但中英关系中一件大事却解决了。11月，中英就香港新机场总体财务安排达成协议。香港新机场及配套工程是目前世界上特大工程，投资巨大且跨越1997年，弄不好会给香港特区政府留下财政包袱。经过近5年谈判终于成了。

英国外交大臣赫德11月2日道出实情：在我们英国看来，这是一种机会，中国正在蓬勃发展，1995年应该恢复两国之间的热乎关系。

香港《星岛日报》11月4日就说得直接：“现在协议机场及地铁公司总借款额不超过230亿，显示中英双方均作出让步。而最重要的，是英方意识到中方在国际财团上的影响力，明白得不到中方同意则难以向外借款。”

实力是第一位的。

(摘自《东方》1995.1.)

(上接第12页)
到。……

CMC在完成30号A洞计算工程量时，科技人员坚持取小数后13位(按常规算到小数点后2位即可)。

中方职工笑他们“太精”，他们说：

“我们干的是‘牌子工程’，能精尽量精。你们难道就不管精不精？”盘道岭施工中，中日一次对400多名中国劳务总工资算法不一，相差0.5元。中方四舍五入，分厘累进，多出5角钱。日方用电子计算机算帐，没有这5角钱。中方认为“5角钱不值得计较”。日方科技人员说：“一丝不差就是企业精神，不然有损熊谷组名声！”

“三国演艺”，使中方从这些细微小事上深刻认识到“群体素质”对现代企业的重要。他们说，中国人个体素质并不逊色，但我们的“群体素质”的确“演”不过这些外国人，其关键在管理。只有加强管理训练，提高中国职工的群体素质，方可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引入大秦工程的这段“三国演艺”，发人深思。慧眼独具的内行人，称这项工程为“双喜工程”：一喜大功告成，兰州北部80万亩荒地将变成绿洲，灌区内40万人可得温饱，还可安置8万多移民，可称“德政工程”；二喜从这部“无字天书”中，读出了我们的差距，催人奋进，为搞好改革开放又添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摘自《瞭望》1994.52.)

引大入秦工程中的“三国演义”

郝永年

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引大(大通河)入秦(秦王川)主干渠,经过八年奋战,于不久前贯通。工程主要在祁连山东段凿山开洞,87公里主干渠,隧洞就占75公里。工程由中、日、意三方的工程公司承包修建。三国工程队伍在一个工地上凿洞,各显其能,人称“三国演义”。八年演艺过程所表现出来的许多问题发人深思,正如工程总指挥韩正卿对记者说的,引大工程是一部改革开放的“无字天书”,从中可以读出许多开阔眼界、发人深思的精彩文章来。

惊人的“隐形差距”

参加引大入秦工程的中方科技人员说,“三国演义”最突出的是显示了科技威力,暴露出我国科技的“隐形差距”。世界公认看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一看财力,二看科技;财力叫“硬性差距”,科技叫“隐形差距”。过去不比不知道,这次“演艺”结果吓一跳。

引大工程1976年我国自行动工修建,到1986年,每年上近万名劳力,共耗资0.6亿元,19年只打通了近10公里的洞。如按此速度打通主渠道得70多年。1986年起公

开向国内外招标,日本和意大利的工程公司中标,从此在祁连山麓展开了这场“三国演义”。

日本熊谷组承建我国最长隧洞——15.7公里长的盘道岭隧道,用54个刀头的悬臂掘进机开挖,平均日进尺6米左右,用新澳法施工(此法国外已实行10多年),不搞常规支护,直接喷涂混凝土,24个日本人加上480个中国工人,5年打通了过去几十年才能打通的这座洞。

意大利CMC公司承建30号A隧洞,技术更加先进,采用美国大动力双护盾全断面掘进机(TBM),开挖、衬砌、灌浆一条龙,日进尺50米以上,300多人、18个月建成了两条总长27.3公里的洞子,创造了日成洞进尺75.2米和月成洞进尺1400米两项世界纪录。至1992年初,日、意两国的公司已顺利完成主干渠一半的工程量。我国有关方面1986年也调来了名牌凿洞队伍,施工队伍吃苦耐劳,能打硬仗,但技术装备落后,用传统的“钻爆法”开洞,日进尺只有两米左右,六七千人,干了8年,才完成了主干渠的另一半工程。

“三国演义”,演出发人深思的两组数字:1.日进尺;意大利50

米,日本6米,中国2米;2.打通一米洞子的费用(人民币):意大利0.7万元,日本1万元,中国1.5万元。事实再一次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可怕的“穷大方”

参加“三国演艺”的外国工程人员常对中国人说:“你们不穷哪,对宝贵的人力、时间用起来比谁都大方。”韩正卿说,这是可怕的“穷大方”,是我国搞工程的通病。

科技人员细算了人力、时间帐,更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一、科技水平不同,“人力帐”含金量不同。国内搞工程大多是“人海战术”,设计不省人力,施工不计人力,返工不惜人力,结果是人力耗了财力;国外凭借先进科技,对人力抠得很紧,把人力变成了财力。CMC承建的30号A隧洞,原来国内设计为7个弯洞,CMC把它们变成了一条直洞,从原来15公里,缩短到11.6公里,节省的劳力和资金高达一亿多元。CMC还将原设计的14个工作面和料场改为一个,节省的劳力直接将工期缩短了一年。

熊谷组开挖盘道岭隧洞,遇到地质复杂、工程量增大的困难,尽管很多低价中国劳力找上门,但他们坚决不搞“人海战术”,而将新澳法三种基本方法扩展为14种技术,用科技力量节省人力。日、意开挖的洞子全是优质工程,可抗8级地震,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取得了极

佳的综合效益。中国公司科技水平低,效益难保,返工洞子2个、桥涵3处,伤亡事故数例。

二、科技能把时间变成财富。外国工程队在引大工程中不管用什么技术,目标只有一个:把时间变成金钱。熊谷组以分钟为单位安排工序,管理到人;CMC用电脑衔接20个工种、14个工序,每日进尺50米,24个小时31个循环,进出洞子62列小火车,分秒不差。中国队施工以小时为单位组合工序,对个人无时间要求,节省或浪费几十分钟都无所谓,结果造成大量“时间财富”的白白流失。

“三国演艺”,演出了另一组数字——不同国家工程队8小时工作班有效利用表:日本7.5小时,意大利7.1小时,中国6.5小时。因而中国人每挖一米洞子的费用是日本人的1.5倍,是意大利的2.1倍。中方科技人员说,有了先进技术和管管理,人是财富,时间等于金钱;没有先进技术和管管理,人可能会浪费财富,时间可能会亏蚀成本。我国“穷大方”由来已久,要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靠先进的科技和管管理来堵住这个暗洞。

引人深思的中外官司

在引大入秦“三国演艺”中,曾发生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中外官司。事虽过数载,但教训难忘。

1987年意大利CMC公司和我国家单位联合中标,CMC出施工

设备——先进的双护盾掘进机，我国联合单位出劳务。CMC对劳务管理很严，而我国联合单位一些人纪律松弛。CMC负责人说：“这样的劳务，再现代化的设备也出不了现代效率”，于是解雇了30多名工人。这一下引发了矛盾，国内联合单位向有关部门状告CMC实行资本主义管理。CMC急了，说：“管理是行为科学，是现代技术，与政治无关。”向有关部门申述，并向中国贸易促进会提出诉讼，要求仲裁。这场官司打了一年多，后来北京有关部门派人下来与“引大”指挥部协商，让两家分开，和平竞争，才平息了纠纷。CMC另用劳工，并招了一批农村知青，培训上岗，严格要求，三个月后便出现了高效有序的工作局面，连续6个月每月进尺千米以上，创造了日进尺和月进尺两项世界纪录。我国联合施工单位也悄悄采用CMC的管理办法，革除积弊，面貌一新。

事过数年，但人们念念不忘。大家认为此事可举一反三，对改革开放有几点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引进现代管理必须破除“忌资症”。引大工程的干部和科技人员说，改革开放需要引进国外科技和管理，对引进科技争议不大，但对引进国外管理则禁忌颇多。尽管小平同志说过：“管理也是一种技术”，但不少人总爱把它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要问个姓“社”姓“资”。必须破除“忌资症”，改革开放才能

排除阻力。

二、深化改革必须搞现代管理。在引大CMC工地上有句话：“中国人加现代管理，就能创造奇迹”。CMC分析他们创造两项世界纪录有三个因素，一靠“能干绝活”的中国工人，二靠“能出点子”的中国科技人员，三靠意大利公司的先进管理。给CMC干“绝活”的，都是普通的中国工人，加上CMC的管理，他们都成了“金凤凰”，30多人成了优秀操作工，6人成了比意大利人还高明的“意大利西餐厨师”。CMC对科技人员更加尊重，引大工程总工程师张豫生1991年对双护盾掘进机提出两条改进意见，第三天CMC就电告美国的制造公司，不到半个月美国公司派人赶到引大工地，当场按张的意见改进，结果创造出两项世界纪录，外国人直夸“中国人了不起”。

引大工程管理部门的人员说，许多事情不是中国人不行，而是管理制度有弊病。

严重的“素质挑战”

在引大“三国演艺”中，中国职工聪明勤奋，个人素质无逊于人；而作为群体素质的企业精神则明显弱于外国职工。引大总指挥部负责人说，这是中国人当前面临的“素质挑战”。有几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引大工程一工区主任莫耀升主管外国工程队，他说从日本熊谷组

海外工事部长大冢本夫为企业饮恨身亡一事，最能看出中外职工的素质差距。熊谷组1986年没有活干，大冢本夫辛苦奔走，在引大工程中承包0.6亿元的工程，功劳不小。但到了1989年，由于日元升值，盘道岭工程量增大，造成公司承包亏损。按常理讲大冢本夫没多少个人责任，但他惴惴不安，引咎自辞，不久含恨身亡。熊谷组在大冢本夫身亡之后成了“哀兵”，面对重重困难，提出“决不放弃，一干到底”的口号，精打细算，每班纪录50多种数据，班后分析改进，越干越精。尽管已经亏损，但对工程质量一丝不苟，最后给中国交出了“放心洞”。而在“演艺”之初，我国的一些工程队，上班纪律松散，遇上质量返工，说：“有问题，大家抬”。弄到后来急得总指挥部下令“停工整顿”。参加引大工程“三国演艺”的外国人不足百人，却出了两个“洋劳模”：一个是盘道岭作业所所长前田恭利，他主持打通了世界上最长的水工隧道，被我国评为国家级劳模。一个是CMC总经理法布瑞丘，他主持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受到甘肃政府的表彰奖励。

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敬业精神极强。前田恭利自称“第一责任者”，对自己的要求是“凡出现施工事故、工程塌方、突发困难这三种情况，必须亲临现场处理”。盘道岭施工5年，5个元旦他全在工地上。每年下头场大雪后他都要徒步把整个工地走一遍，全局在胸，一旦出事他即可迅速决策处理。1991年井下发生重大泥石流塌方，他第一个赶到现场，在稀泥中连干了三天三夜。处理完事故，手肿得脱不下手套，脚肿得脱不下袜子。CMC的法布瑞丘发誓在中国要为CMC争气。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在中国市场立足”。开始掘进效率上不去，他日夜泡在工地上，发现衬管质量差影响进度，便对7个环节制定严格操作程序，废管率控制在千分之五以内，超过世界同行业要求。

与之相比，我国的工程队相形见绌。有家单位因事故将一台几十万元设备埋在地下，无人过问；有些领导不负责任，推诿扯皮，造成工程损失，不了了之；有些人官架子十足，井下出了问题不“请”不

(下转第8页)



美国影视业与亚洲市场

——在中美知识产权之争的背后

仲大军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争执的焦点之一——是音像产品。美方之所以在中国盗版音像产品上大做文章，不外乎想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市场。在美国娱乐业看来，中国娱乐影视消费市场是一块肥沃的处女地，但由于中国官方的限制，美国商人一直步履维艰，难以涉足。如何打入中国市场，已成了美国娱乐影视界的一个研究课题和战略目标。

独占世界鳌头的一大产业

90年代，虽然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但并没影响其产业结构的演变。娱乐业与信息业一样，都是一个后起的第三产业。美国实业家亚科卡曾精辟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娱乐业将成为90年代的新兴产业。”此话道出了美国经济正在发生的一些新变化。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美国《商业周刊》计算出：1993年，娱乐消遣业增加了20万名雇员，占当年新增雇员总数的12%，其结果，1993年，美国人用于娱乐消遣的开支达到了3400亿美元。

娱乐业已名副其实地成了美国

的支柱产业，以致欧洲和日本都在嘲笑美国的经济成了“米老鼠”经济。

美国娱乐业的主力军——影视业，也正在利用这一形势大干快上。1994年，美国国内用于影视娱乐的开支达到了300多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7.4%，而财大气粗的好莱坞在这一年里出产了198部影片，比上一年增加了20部。美国的影视业早已是雄居世界第一的大产业。仅在欧洲市场，美国的电影电视片每年就给美国挣回90多亿美元，为弥补美国的外贸赤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美国的娱乐影视制造业雄居世界各国之首，它不仅在国内是一大支柱消费产业，在国际贸易上，也是美国的强项出口产品。它的影视产品不仅占据了欧洲85%的市场，也几乎控制了拉美国家的半边天。面对所向披靡的美国影视片，欧洲人每每发誓要夺回被占据的市场，纯洁自己的传统文化，但在好莱坞影片那不可抵挡的诱惑和冲击下，欧洲制片商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

然而在亚洲，美国影视娱乐业碰到的却是另一种命运。

难开垦的处女地

虽说这是一片被好莱坞称作“未来市场”的土地，但1992年，美国各大制片公司在印度获得的收入仅有7万美元。这个数字让美国制片商寒心得几乎落泪。

日本在经济实力上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然而在娱乐影视产品的进口上却是个小得可怜的侏儒。1992年，好莱坞各大公司在日本电视台出售的影片总共才获得8800万美元的收入，而1993年甚至连7000万美元都没有。虽说这与日本的经济衰退有关，但检查制度、政府控制、文化差异和观众绝大多数喜欢本国的节目，是美国片难以赢利的主要原因。

在亚洲另外8个国家的市场上，美国各大公司1992年的收入为30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中国。据报道，华纳兄弟公司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大约每年才得到100万美元的收入，而电影的收入只有1万多美元。综括起来，美国影视公司在整个亚洲每年的收入不过2亿美元。与欧洲的90亿相比，这2:90的比例，差距何其巨大，何其遥远！对此，美国人能甘心、能心理平衡吗？

发行商们在做市场调查时估计，中国拥有12亿人口，2亿个家庭，一年两三千亿美元的消费能力，只要稍稍加以开拓，便有一个数亿甚

至上十亿美元的大市场。

但前几年中美国娱乐音像产品在中国销售的情况如何呢？看一下1993年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在这一年，中国从美国进口游戏机966台，价值292万美元；磁带和唱片共186万美元。这两项加起来还不足500万美元。至于说从美国进口的电影片、电视片及其录像带和激光唱盘，虽然广电部没有确切的统计，但估计也不超过几千万美元。而美国《亡命天涯》这一部影片的全球票房收入就达到了3.6亿美元。美国人抱怨说，中国每年只允许进口10部美国影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影视片能进入中国市场吗？

对于进口影视产品，中国政府有明确的规定，电影方面，进口片不能超过国产片的1/3；电视方面，海外片的播放时间不得超过总播放时间的25%，黄金时间的15%。这几项规定以及某些对内容方面的限制，使美国娱乐影视业的商业利益在华大大受阻。因此，想方设法迫使中国政府放松限制，是美国商界和政府的一致行动。

另一使美国人赚不着钱的重要原因是盗版问题。虽然美国影视业在亚洲的收入仅有2亿多美元，但走遍亚洲国家，到处都不难看到大量的美国影视片。仅盗版一项使美国每年在亚洲造成的损失估计不下几十亿美元（包括计算机软件等）。因此，盗版问题已成了美国商业利益的心腹大患。而亚洲，是盗版活

动的重灾区 也是美国采取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的重点地区。

桌上施压 桌下试探

鉴于此,美国人在各个领域齐头并进采取行动。一边在谈判桌上施加压力,一边大力进行商业探索。最近在中国上演的美国影片《亡命天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美双方第一次采用了票房利润分成的方法。美中两方四六分成,中国拿大头。其结果,仅首轮演出就获得票房收入1300万元人民币。能说中国市场是一片贫瘠的不毛之地吗?美国制片商从此次实验中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分帐影片估计会成为今后美国影视打入中国市场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做法既可获得丰厚的商业利益,又可以较好地保护影片的版权。在俄国,美国制片商也正在以分帐制打入那里的影视市场。分帐制是一种把本国放映公司的利益与外国影片商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做法。这样做对销售商最大的好处是影片不易被盗版,并能获得极大的市场收入。在俄国放映《墓碑》这部西方影片时,它的复制拷贝都是亲手递交和护送过海关的,在放映场次中间,拷贝都锁在保险箱里。在放映时,对电影院中的摄像机都要进行防盗版检查。

美国影视商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通过某些具体例子可见一斑。例如,为了《亡命天涯》一片在中国

的放映,美国时代—华纳公司的董事长亲自来中国走了一趟。由于美国制片商们对亚洲市场的大力开拓,1993年和1994年,某些公司成绩斐然。华纳兄弟公司1993年由于发行了一系列热门影片,如《蝙蝠侠归来》、《致命武器》、《侠盗罗宾汉》等,致使它在亚洲的收入猛增42%,1994年又增长了20%。另外,韩国国内电视台之间的竞争,也使美国影片的价格上涨。由于韩国一家私营电视台于1991年开播,每部美国电视片拷贝的价格从平均1.2万美元上涨到3.5万美元。在台湾,由于三家独立电视网与大批有线电视台进行竞争,美国影视片成了与对手竞争的武器。

然而,这一切距美国影视业的要求还差得甚远。美国制片商的胃口是巨大的。打破亚洲的东方文化堡垒,是美国娱乐影视业的长远战略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国家如何应对,是各个国家值得深思的事情。目前中国的影视业一直处在一种低谷的状态。在现有的各种规定保护之下,欧美片已有泛滥之势,当然,这里有盗版因素,如果整顿市场取得成效,这一现象会相应减弱。但如果进一步放开口子,对国内影视界必将带来一定的冲击。利弊如何,有待人们讨论。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1995.2.3.)

黄克诚自述

“违心地作检查，才是我真正的错误”

黄克诚(1903—1986)，1923年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两万五千里长征。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成了主要的批判对象之一。“四人帮”粉碎后，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黄克诚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黄克诚在逝世前的几年中，把自己一生经历逐渐回忆述说了一遍，由夫人唐棣华为主要执笔人，记录整理成40余万字的书稿《黄克诚自述》，该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将这份自述中有关庐山会议的内容，摘录如下——

1959年6月底彭德怀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初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而我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

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他们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也和他谈过一些国内情况，可能加重了他的忧虑情绪。彭德怀6月底收到开庐山会议的通知，他不想去，让我替他去。我说：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我又问他：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去开会了。在会议中他对就事论事不满，对没有尖锐的意见不满，认为纠“左”的措施不力，因而写出了那份有名的“意见书”。

庐山会议召开时，我在北京守摊子。彭真和林彪也未去庐山，似乎都没想到会出什么大问题。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后，中央通知我去开会。我有点意识到会议上分歧严重，彭德怀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意见书”已打印出来，看来可能要受批评。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